

李元星◎著

济南出版社

甲骨文中的殷前古史

——
盘古王母二皇夏王朝新证

甲骨文中的殷前古史



甲骨文中的殷前古史

—— 盘古王母三皇夏王朝新证

李元星◎著

② 济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甲骨文中的殷前古史：盘古王母三皇夏王朝新证 /
李元星著. — 济南：济南出版社，2010. 9
ISBN 978 - 7 - 5488 - 0089 - 7

I. ① 甲… II. ① 李… III. ① 中国—古代史—研究—
三代时期~夏代 IV. ① K220.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67133 号

甲骨文中的殷前古史：盘古王母三皇夏王朝新证 李元星/著

特邀编审 / 靳 永

责任编辑 / 王淑铭◎戴梅海

审 读 / 王淑新

装帧设计 / 戴梅海

出版发行 济南出版社

地 址 济南市二环南路 1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 jnpub. com](http://www.jnpub.com)

电 话 0531 - 86131726

传 真 0531 - 86131709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4. 25

字 数 400 千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9. 00 元

发行电话 0531 - 86131730

86131731

86116641

传 真 0531 - 86922073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出版说明

李元星先生的这部书稿，利用甲骨文字资料讨论了殷商以前的古史问题。他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有些结论和当前学界的看法不同。本着思想独立、学术自由的原则，我们出版了这部书稿，以期引起大家的争论，从而促进学术界对商前古史的思考。

李元星先生这部书稿的成书时间较早，他有自己的行文特色，与现在的学术论文写作规范有些差别。因为作者年事已高，无力再对书稿进行修订，我们出于对作者著作的尊重，保留了书稿的这些特色。

李元星先生在艰苦的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中，毕生发愤著书，长期坚持研究，需要很坚定的精神力量的支持。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拳拳之情，令人感佩。这也是我们出版这部书稿的原因之一。

这部书是写于。

“瞻(卬)于~東”即“卬于夏東、夏東”

》：“聾(聞)于~東”即“聞于夏東”。夏東。

② 东方。《诗·秦风·车邻》“东莱大东，至于海邦”。

清溪”的“百”部道是指出了口，这臂臂手比右
口部在上唇唇下，他的是下唇的，在唇下下巴
人身侧左臂。
从发音，是平舌，是左臂的
不表，就可转化的。与素十等是大同小异，

证法正与下列各例相仿:

正解，以
望（明視）理不
香，唯道
是“妙”

華(如華)

目 癸 (履癸) ... { 室妣 不 儿子 口 富 (履癸) }

族宗一妻孟(提議, 贊成)
正職(提議, 贊成) 伊歌

子族... 子乙... 子大甲

[illegible]

救(政)府 (Ueno 蝦夷 = Ainu) 王丁! (54人)

“复(腹厚也)放(放)!”(厚得(厚)放)

王季(公)……
曹(公)……
多子族令比命要古王事!真:解作0作!
……

“团结就是力量”

(3) 多子孫比大栗 (通) ^{Uigur} 韃靼 (吾爾) ^鬼 鬼。頁: 比印 (十)

作者手迹

作者简介

李元星，1921年生于大连。1937年为大连二中初二学生，因卢沟桥事变有感，休学回家，专读中国书，包括鲁迅的几乎全部著作。1940年以后，结识了罗振玉承重孙罗承祖先生，在旅顺罗振玉家中接触了大量的甲骨文、青铜器诸文物，进一步学习了中国传统文化。1941年在伪《满洲国语》杂志上发表《标准语》一文，公开反对以日语作伪满洲国标准语的日本国策，主张以北京官话作标准语。

旅大解放后，作者于1946年通过中共旅大行政办事处首任主任廖华同志3次电告党中央，经过毛主席亲自过问，才使苏军把罗振玉大云书库中的中国图书、甲骨文、青铜器诸文物从“对日战利品”中剔出并返还中国。1947年，作者任大连关东文法专门学校教员，讲授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和中国通史；1948年任大连县立中学首任校长；1953年任旅顺博物馆研究员、陈列组组长；1986年元月离休。

李元星先生毕生仅有《甲骨文中的殷前古史：盘古王母三皇夏王朝新证》这本专著。该书1953年立说，1963年成稿，1966年“文革”抄家失稿，1968年凭记忆重现略稿，1980年写出详稿在征求于某意见时被扣留，1981年又另起此稿即第十一稿。2007年元月13日，由其长子成斯、次子成充对此书第十一稿完成二校、抄写并监督打字。

整理者简介

李成斯，李元星长子，1940 年生于大连。1965 年毕业于沈阳体育学院，获国家运动健将称号，所创辽宁省三级跳远记录十多年后被“亚洲飞人”邹振先打破；后任田径教练，培养输送世界冠军两人；先后被授予先进工作者、优秀田径教练员称号；2000 年退休。

受父亲的影响，李成斯先生对中国历史和甲骨学产生兴趣，多年以来参与本书的讨论、整理、校字和打印工作。

李成充，李元星次子，1943 年生于大连。1964 年于辽宁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中毕业，同年调入辽宁省田径队做运动员；1979 年结业于辽宁自然辩证法培训班（中共辽宁省委党校、辽宁社会科学院联办）；2003 年退休于大连体校（一级教练）。

自幼受父亲的影响，酷爱学习，对自然科学、哲学、中国古代史、甲骨学有浓厚兴趣，长期致力于本书的成书工作。

序 言

韩树英

读者面前这部《甲骨文中的殷前古史》一书，是旅顺博物馆市地级离休干部、研究员，今年 90 岁的李元星同志，历尽坎坷，由 50 年研究成果结集而成的毕生力作。本书的内容和基本特点，正如本书书名所示，作者用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系统文献商代甲骨文作为第一手的材料来研究殷前古史——盘古、王母、三皇、夏王朝。书中之论“持之有据、言之成理”，以继承前人成果为基础，有新的独立见解和对前人的大胆突破，读起来令人耳目一新。我信服作者的才、学、识，也欣赏其不拘一格的文风。向济南出版社推荐出版，承蒙不弃，得到慨然允诺。

书稿付梓之前，作者约我写序，我感到不能胜任。自己早年留学日本，参加我党地下外围组织秘密读书会时，即读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并买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日译本，准备日后研究一下中国的古代社会，但以后一直没有得到机会。因感到此项研究的必要并且抱有兴趣，也不时查看国人研究的进展信息，深感聚讼纷纭，问题很多。以后几十年，因我的专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虽说此问题和我的专业也有关系，但精力有限，无暇抽出时间专心进行研究，因此不能像中国古史学者、甲金文学者，对作者研究的成果作出准确公允的评价。但转念，我既负有推荐之责，更乐见这位同乡和早年同事的书早日问世，也就答应了下来。

由于作者长期是在特殊状态下从事本项研究和写作的，成果不能得到发表，研究情况也就不得为外间所知，为便于了解，本序言也就不得不多费了笔墨，带有了情况介绍的目的，因而写得过长，还请读者谅解。

顺便在此说明：一、我和作者是大连同乡。作者 1921 年生于旅顺地区农村的知识分子家庭。二、我们曾为同事。大连解放后，我由太岳抗日根据地被派回家乡工作。因大专学校未能复校，奉命创办大连高中并任校长，作者从女中调到高中，任历史教师，为同事。当时的印象他是一位通经史、博学多闻的谦谦君子。不久我调任大连市教育局副局长、文教局长，主持工作。大连高中升格为关东文法专门学校，他继续在此校任教。1950 年我被选调北京考入马列学院（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4 年毕业留校任教至今，中间从 1983 年任中央党校副校长 5 年。我关心家乡的发展变化，也大略知道作者近 30 年的不幸遭遇。知为冤案，但我无能为力解决此问题。2002 年，在大连一个研讨会上我请他参加，得以重见，并见到他的论文《殷王所祀黄与黄尹即黄帝考》，叹为果然“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52 年后重逢，他从当年的青年古史学人，饱经沧桑，已成为造诣很深，能独自申明一家之言的古史学者、甲金文学者。知他有多篇殷前史文章，建议他早日整理成专著（即本书）出版。他整理一篇送我，我即读一篇，6 年之间，我占用了部分研究专业课题的时间，怀着很大兴趣读了几遍全部书稿。初读感到新说创见，琳琅满目，目不暇接；结合查阅引用的典籍、文章再细读，才觉得曲径通幽，渐入佳境；及至把握了全书的宏旨大义，掩卷而品味咀嚼其得出众多创见的曲折而令人信服的过程，乃感到此书的深度、广度，觉得读来真如醍醐灌顶、兴趣盎然，才推荐出版。

总之，我不揣谫陋，对本书的某些论断也有待弄清弄懂，而犹愿写序推荐此书，盖因本书研究的乃是殷前古史的甲骨文新证，着眼于终止疑古思潮，正中华民族之本，清中华文明之源，不仅具有理论的学术的创新价值，而且具有有益于振兴中华事业发展的现实实践作用。

据我所知，对夏代之存在在国内虽然分歧已不大，但有些人认识仍未必牢靠，至于国外学术界不愿承认其存在者仍大有人在，遑论上溯到 5000 年前的中华文明之源头的承认！现在我中华社会发展的历史要求是振兴中华，以使中华文明在世界史的发展中发挥应有的历史作用。弄清殷前古史的历史线索，就显得是更加重要的基础性问题。而本书对殷前古史从甲骨文中探寻第一手的新证，应该是基本功。在我看来，本书又是近年同类书中的上乘之作。它至少作为新的一家之言，值得学界及广大读者注意，并以百家争鸣精神，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以推进殷前古史的研究工作。这既是本书作者的愿望，也是我之勉为其难写序，介绍有关情况和我的读后感言的目的和愿望。下面就我所知，对本书的写作做一些介绍，谈一些读后感，就教于读者和各位方家。

一、作者研究殷前古史和写作本书的缘起

1937年对国家和作者来讲，都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年份。抗日战争爆发，作者决心从日本中学辍学回家，“唸中国书”，走家教和自学成才的道路。他学了做过私塾教师的祖父留下的一系列国学典籍，又阅读了留学日本的长兄带来的《新青年》等“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新思想的书籍，包括几乎全部的鲁迅著作以及一些介绍马列主义的书籍。难得的是他经同学介绍，得到了家居旅顺的罗振玉承重孙罗成祖的帮助，吃住在罗家，有幸展观，亲手摩挲和阅读罗家贞松堂和大云书库所藏我国历代文物精华，包括大量甲骨文片、拓片、铜器，直接接触了罗振玉、王国维之学（二人曾为姻亲），并获得部分罗氏手稿与影印书底本。这就奠定了日后进一步研究甲金文的专业基础。

1945年日本投降，苏军解放大连，使大连成了苏军军管、我党实际领导下的特殊解放区。很多党的高级干部、全国知名文化人士如吕振羽、李一氓等都纷纷来到大连工作。大量的马列主义书籍也源源不断地从延安、莫斯科等地运来，大众书店（三联书店分支）也大量翻印出版延安和上海等地进步书籍和党的文献，并出版了旅大区党委组织编辑的大连版的《毛泽东选集》。为了输送干部支援全国解放事业和建设新旅大，“发展文化，培养干部”成为旅大区党委两大纲领性口号之一。

党决定在广大干部、职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开展学习和普及马列主义理论和毛著等党的文献的活动。那时的大连，万象更新，学习马恩列斯毛著作蔚然成风。作者不但自己学习马列主义、毛著，而且还在大连高中、文法专门学校除了用新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讲授中国通史以外，还系统讲授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留有十几万字讲授提纲。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也使他自已不断加深对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认识，从而获得了新的研究甲金文的锐利思想武器，因此使人感到他的古史见解往往论高一等。以上所介绍的就是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古史、甲金文研究工作者所积累的研究工作的条件，以此为基础，他边干边学几十年终于获得了今天的成果。

1937年，另一影响他一生的事情是读到一篇至今不能忘怀的疑古派爆炸性总宣

言式的杨宽的文章，它说：“近顾颉刚、童书业二氏作夏史考（其夏史三论已刊《史学年报》二卷三期），证明夏史之皆属虚无，无不由神话传说辗转演变。夏史既由演变而成，‘夏’之一名安知其非演变而成乎？”^① 杨宽文中所说：“辗转演变”即顾颉刚所说周前古史是战国至汉六百年间“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完全是一篇糊涂账，二千余年来随口编造”。（临终之年，他在北京还讲：“《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信一发表，竟成了轰炸中国古史的一颗原子弹”）这些问题一直在作者心中激荡，真的吗？多么令人迷惘。究竟如何？因此，作者才发下宏愿探索我国古代信史。

我中华本来有一个从文明时代以前一直传承下来的信史知识体系，作者也一直深信不疑。它记载在大量的历史典籍中，也在人民群众中口碑代代相传，直到今日。毛泽东 1935 年在讲到长征意义时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就是现实的例证^②。疑古派就是要否定和打碎这个体系。顾颉刚原来力主周前无古史，1925 年王国维用“二重证据法”证明地上的典籍和地下出土的殷墟卜辞记事一致。这迫使疑古派不能不从周前无古史退到说殷前无古史。因此作者就立志下功夫从甲骨文中探寻殷前古史新证。

1953 年作者调到旅顺博物馆做研究员工作，古史研究定向，《夏字考》立说。《夏字考》就是要在甲金文中找到曾经普遍赫然存在的“夏”字，找到记载夏王朝的记录，并在它的基础之上，上溯夏前古史。继承前人，又突破前人，用真凭实据打破“古史辨”疑古学派。借用王国维做学问成功必经的三个境界的第一个境界的说法：“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③。古史辨派是“西风”，他只能立志“独上高楼”，对古史体系借甲骨文一探到底，“望尽天涯路”。

二、 崎岖的道路，强大的动力

正在作者春风得意、踌躇满志，准备在学术上一显身手之时，极“左”思潮渐

① 此段引自 1937 年“古史辨”学派的《禹贡》杂志第七卷（六、七合期）《说夏》一文。

② 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 150 页，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2 版。

③ 晏殊：《蝶恋花》。

起，噩运也正向他逼近。

在日本统治大连时期，作者是一位爱国的热血青年。1941年他在伪《满洲国语》杂志上发表了《标准语》一文，公开反对用日语作伪满洲国标准语的日本国策，主张用“北京官话”作标准语。因此受到日本特务机关的审讯。最后被当局不当村长就以“反满抗日”罪论处所胁迫，无奈当了伪村长。不过在任职期间，在殖民当局的压迫和剥削下，还尽一切可能维护了村民的利益。他不让村警防团抓越狱逃脱的“抗日放火团”成员；公开向村民宣传“日本必败”！事后被民族败类检举，遭日本宪兵队逮捕拘留。多亏罗家解救，作者才逃过此劫。大连解放，由于作者上述表现，又被村民选为第一任人民村长，并受到人民政府任命。后来中学复校，作者到市女中任教，参加了革命工作。

作者还做过一件难得的有益于祖国文化遗产的事情。苏军解放旅大后，占据旅顺罗振玉家，把大量珍贵的藏书、各类文物，通通以对日战争“胜利品”的名义，据为苏方所有。多年来深知罗家文物、书籍价值的作者心急如焚，迅速将此事报告给延安来的掌管大连文教事业的老干部廖华同志，由大连上报延安。据传，毛主席亲自过问此事，请斯大林下令苏军将罗家文化遗产归还中国，最终由廖华代表我政府接收，并做了妥善处理。这是作者爱国行动的佳话。

1955年肃反运动中，作者因当过伪村长，以“历史反革命罪”遭逮捕审查10个月。1958年因“右派”言论，以“反革命罪”判刑4年。1962年刑满释放，又被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回乡监管劳动改造，直到1980年彻底平反恢复原职工作。

作者身处逆境二十多年，不但没有颓丧，反而激起了他研究殷前古史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的强大动力来自坚强的两个信念：一是，是否尊重中华民族的传统历史体系，是关系国家兴亡的大事。二是，要有坚定的群众观点。不但相信现在的人民群众，也要相信古代的人民群众。亲身创造其历史的历代人民群众对于自己本民族历史必有真知、真传，任何人不能掩尽全民的耳目，特别是有关全民族的大事，如王朝的兴亡，这绝不可能伪造，也没有必要伪造的。“古史辨”疑古学派顾颉刚的从战国到汉600年间“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既不符合旧石器渔猎是伏羲时代、新石器农业是神农时代、青铜文明是黄帝时代的考古事实，又违背了中华民族的史训：“亡（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①。作者在本书的开端部分“殷代

^① 清末龚自珍：《古史钩沈·二》。

甲骨文中所见王母三皇史实考——终止疑古”篇引用了这一史训，在全书的结尾篇又加以引用，在全书是一以贯之。作者自知俯仰无愧，从此别无他念、心无他骛，钻进了研究殷前古史之中。他在书中写道：“尔后40年间，历史风暴叠起，手边资料烟飞云散，比失去生命都痛苦。系统研究没有可能了，但是任何时期的幽约作苦的间隙，心田上还保留着一小块科学自由的基地，可以作上下几千年甚至几亿年的逍遥游，尽管身在管制之下，心永远在九天之上。这种生活方式不仅耐死，而且益智”^①。

1963年《夏字考》成稿；1966年“文革”抄家失稿；1968年凭记忆重见略稿；1980年写出详稿被扣，底稿亦随行李一起遭小偷盗去；1981年又另起此稿即第十一稿。此后近30年，作者不断地对文稿进行增补修订。“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范文澜：自题书斋）作者的板凳岂止坐了十年之冷？

这种信念成为强大动力，支持和激励他走过崎岖的道路。不怕任何艰险，顶住各种压力，达到他的目的，也使他的精神境界升华到并非常人所能企及的高度。王国维《人间词话》中第二个境界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②。作者的第二个境界岂是它所能形容得了的？

此书结构，我认为有如下3个特点：一、全书文章排序的方向，和作者实际研究的方向基本相逆。其中《夏字考》一文，是研究殷前古史的起点、基础，也是作者花费时间和心血最多的部分。二、全书文章分为作者原文和其次子成充通俗化改写的两个部分。非专业读者可以先读通俗化改写部分，这样可以减少“生僻古奥”的甲骨文给读者带来的不便。三、书的最后参考文献，是全书有机组成部分，从中可以了解作者是在哪些前人、哪些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创见的。清代学者说“证不十，不立说”，作者之证，积4000年，八大项，743种（件）。其中甲骨文献82种，金文（书目、器目）198种（件）、基本文献463种，以经书来讲就是十三经俱备，洋洋大观，在中国文字考证史上，实属罕见。用功之勤，涉猎之广，引用一如成竹在胸，信手拈来，又不为掉书袋、“獭祭鱼”，毫无卖弄知识之嫌。他做学问的认真态度令我掩卷兴叹。

① 见本书第53页。

② 欧阳修：《蝶恋花》。

三、殷墟甲骨文中的殷前古史新证

王国维所说的第三也是最后的境界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①对本书作者来说，这第三境界则是，在回答他是怎样突破了前人至今也没能够突破的难关，究竟得到了殷前古史什么样的新证时，要涉及到许多方面的问题，而吾人对“蓦然回首”所着重关注的则是，他在“众里寻他千百度”时，是怎样寻找出各种有关的规律，怎样从历史的总的联系去把握问题，即怎样实际地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把一般的规律和当前研究的实际相结合而找到正确答案的。让我们沿着作者的思路：在《夏字考》中从〈甲〉（1）甲骨文中确有夏字；（2）夏王朝存在的研究谈起，看他是怎样找到新证，找到的又是什么样的新证，再讲〈乙〉殷墟甲骨文中确有殷前古史体系。

〈甲〉（1）殷墟甲骨文中确有夏字

目前学界对春秋时期以前的夏字尚未认识^②。作者从这个实际出发，循着前人的思路把旧有的篆字概念一分为二，分成春秋时期以前的“古篆”和其后的“今篆”这样两个新概念。这样他就凭着“一个极其清醒的‘今篆’之前，还有一个失传的‘古篆’阶段这样一种文字变动史的观点”的理性力量^③，在殷墟甲骨文中打开了寻找古篆夏字的突破口。既然已识的今篆夏字是由未识的古篆夏字变动而来，那么与已经从历史上消逝的古埃及象形文字、两河流域渐由表形表意演进为表音的楔形文字、南美表音又表意的马亚文字等的简单组成有所不同，从独特的由“形、音、义、法（事、史、文法）”4个要素组成的汉字及其变化规律出发，自然可以推定：未识的古篆夏字和已识的今篆夏字其“形、音、义、法”应当紧密相联，在历史变化中其组成基本不变。而甲骨文中确实有一个属于国族氏姓专名的字，既是突出地多为一百数十见（在早期金文中也约十见），又是可以粗粗分为甲、

① 辛弃疾：《青玉案·元夕》。

② 见本书第46页《夏字四千年变动表》。

③ 见本书第60页。

乙、丙三种类型的整体大人之形的简化字^①。这是个什么字？今人都不认识了。这个事实使人情不自禁地想起了这与唐人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情景何其相似。

将已识的春秋期《秦公簋》和汉印的今篆夏字与甲骨文中的两个推定的古篆夏字相比较^②，其[与古篆“𠂔”（子）字襁褓之形明显对立]义为大人、大的整体人形的结构、性质完全相等相通，并在文句以及全部甲骨文献中，又地位显赫地既与“夷”连用，又和“羌”、“鬼”诸族并立的事实，迫使人不得不推定：它们不是古代中国“中国之人也”的专称“夏”字，又是什么呢？不过从汉字的4个组成要素来看，到此这又都是只识了“形、义”，还需要进一步证明其具有夏“音”夏“法”，才能最后完完全全毫无疑问地确定它们是失传了的古篆夏字。

如何证明这些字具有夏“音”夏“法”呢？1969年西周初期铜器《启卣》在山东黄县出土了^③。它上面有“啓从征，勤不夏（暇）”借“夏”为“暇”的铭文。因为夏、暇音同，所以夏形字具有夏（暇）“音”得到了《启卣》铭文的肯定。这是来自地下直接了当的文字学和修辞学的铁证。它不是一时存在的孤证，因为西周初期“借夏为暇”的这一行文习惯，一直到后汉持续了一千多年。如在后汉郑玄所用的古文本子《尚书·多方》以及《灵台碑》中，皆然。地下地上“二重证据”足以证明：古篆夏形字具有夏“音”。现在，只差一个夏“法”，证明就完成了。

“法”指“事、史、文法”。具体来讲，某字认成和读成该某字，就合乎所指的“事”或者某“史实”或者某句子的“文法”，就是合乎“法”，否则认成和读成另外的字就不合“法”；合乎“法”，文句就读得或说得通或合乎文法，不合乎“法”，就读不通或说不通或不合文法。

后文还要说到的例子：“夏”法是指该字本为“夏”字，如“𠂔”本为古篆“夏”字，但在特殊场合又可以当成“𠂔”（望）的省略字用。东汉许慎的《说文·八上》就说“𠂔，古文𠂔省”，后人包括罗振玉、王国维等大学问家，据此把只

① 见本书第46、47、76页的3个表。

② 见本书第77页。

③ 见本书第188页注①。

在特殊场合可以作为“𡗗”的省略字的“𡗗”（夏）字，无条件的都认作“𡗗”（望）字，就是不合“夏”法的例子。结果殷墟甲骨文中所有的“𡗗”（夏）字都被认作“𡗗”（望）字，因此许多人认为殷墟甲骨文中没有“夏”字。

作者首先从夏字以外更广泛的中国历史，包括商代在内的几千年来基本没有改变的东方“夷”，西方“羌、鬼”诸民族分布地理方位的整体联系中，即中国历来只有“夏、夷、羌、鬼”而绝无“𡗗（望）、夷、羌、鬼”、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什么“𡗗”民族、“𡗗”国诸族并立局面存在的历史事实证明：古篆“𡗗”具有“夏”法，即只有读“𡗗”为夏而不是“𡗗”，在中国历史上才说得通的。具体的证据，在书中夏字其余的4个本证简例中比比皆是。特别在《子、王矛盾表》中^①，尤为突出、集中、鲜明、生动。作者不厌其详地既从夏字以外，又从夏字本身全面论证了“𡗗”字具有夏法，即在殷墟甲骨文中读“𡗗”为夏，左右逢源，一通百通；而读“𡗗”为“𡗗”，则左右为难，一窍不通。至此，古篆夏字的形、音、义、法4个组成要素齐备，殷墟甲骨文中确有展示夏王朝的古篆夏字的存在，已经是铁案如山，不可移了。

此外，辨认夏字（包括古篆）还需要理解另外的准则、规律。古篆夏字在殷墟甲骨文中字形百出，想一下子就可以认出它们是否夏字要遵循的规律是：“在全字音、义不变的前提下，字的局部（引者按：如字中表示头的部分）可用异音的同义词（引者按：“臣”与“首”）亦即异形的同位字（引者按：“首、𠂔、𠂔、目、𠂔、日”）来代替，不受限制”^②。全部古篆夏字依头的部分可区分为“臣、𠂔”两系。“臣”的异音同义词有“𠂔”、“元”等，所以臣系又称元系；“𠂔”是“首”的同位字即首字的省形之一，依由繁至简的逻辑之序，首的同位字即首字的省形是首→𠂔→𠂔→目、𠂔→日等，这就是首系。古篆夏字的头可用元、首二系的臣、首以及它们的每个同位字分别来表示，换头之术不受限制。这是作者对四千多年以来夏字字形变化规律性的总结^③。由此一切古篆夏字在上述两个表之中，皆可找到自己历史的和逻辑的位置。

商代元、首两系夏字并存共用，周代初期元系夏字即遭淘汰，成为旁支，仅作为偏旁残存于𡗗（望）字之中。首系夏字是贯穿4000年的基本字形。𠂔不独立存

① 见本书第202页。

② 见本书第124页。

③ 见本书第46、47页两表。

在，而在于夏、頁之中。今日夏字简率已极，仅由头、足相连而成，省去躯干和双手，出现在汉代以后^①。用首和它的同位字来表示头的字，今天还可以见到，如首夔、夏頁、蜀親等等。至于夏字的其他变形，作者又述有“夏字再省形”、“夏字的微变形”等，敬请读者耐心阅读原著^②。

作者之所以从方方面面论证“夏”字，不厌其详，无非是要证明甲骨文中确有形状不同的夏字，为后面的研究奠定坚实基础。

〈甲〉(2) 殷墟甲骨文中确有夏王朝

甲骨文中古篆夏字既识，便开辟了新的证明夏王朝存在之路。作者研究表明：虽然只在一期卜辞^③中才有，但在卜辞人名中又是出现次数最多（至少 120 例以上），而为商王朝无法不注意的人物，便是夏桀。现在的“桀”字在殷墟卜辞中写作“𪔐”。过去个别人将卜辞中的夏桀误识为“马乘”（孙诒让），而自罗、王二氏以来，则皆误识为“望乘”即“望乘”了^④。古篆夏字作者已识，便将“望乘”改为“夏乘”。但是查遍文献，夏代并无“夏乘”此人，原因何在？原来前人将卜辞中的古篆形声字“𪔐”，一概误识为古篆西周金文和今篆秦小篆中的会意字“乘”了^⑤。此关一破，夏王朝存在的卜辞证据便蜂拥而至，目不暇接了。如卜辞英 1555：“夏桀用饫祭祭祀夏启，乞求他的保佑。”^⑥ 在一条卜辞中夏王朝的“夏传子，家天下”第一位夏王夏启与亡国之君夏桀俱在，夏王朝的存在难道还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吗？

更为精彩的是，作者发现了历史上前人从未发现的“殷革夏命”当时决策的全过程^⑦，现从本书中摘录 18 条如下：

1. 乙编上 1052：“今五月反！”——首期殷墟卜辞是为子姓首领父乙即商汤而占。

① 见本书第 67 页。

② 见本书第 184~193 页。

③ 甲骨文亦称卜辞。目前学界把十余万片甲骨文共分成五期，一期是最早的商王武丁时期的卜辞。

④ 见本书第 170 页。

⑤ 见本书第 170~173 页。

⑥ 见本书第 173 页。

⑦ 原卜辞见本书第 238~240 页。卜辞前面的“乙编上”、“合集”等皆为甲骨文专著名字的简称，如“乙编上”、“合集”分别是《甲骨文乙编上册》、《甲骨文合集》的简称，后面阿拉伯数字，则标明此卜辞在该书中的位置。